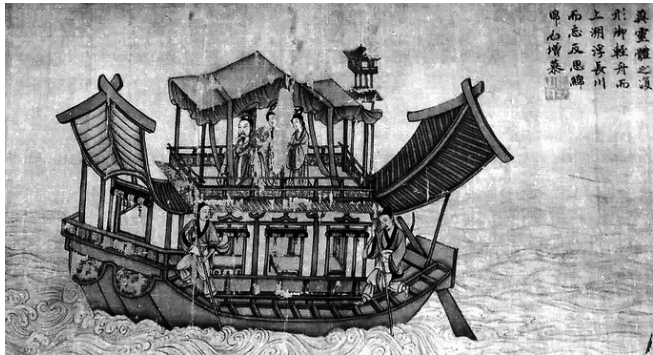


古代画舫里的悲欢离合



前段时间，辽宁博物馆举办了“古代绘画展”，向世人展示了多件国宝级的绘画，其中就有宋摹本东晋顾恺之的《洛神赋图》。在这幅图里，除了飘然若仙的人物形象，其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，那就是“画舫”：一艘气派的双层画舫，楼上有两个女子陪侍着主人，下层有两个舟子正卖力撑船。画舫是古代生活中特有的一种交通工具，典型的舫是两船并列、连成一体，不仅增加载客量，而且抗风浪，在水面上比较平稳，因为一般有华丽的装饰，遂称“画舫”。

在古代生活中，船是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。船行于水上，载客运货，方便人们的生活。因此，在数千年的历史中，不管是历史典籍，还是诗词歌赋，都少不了船的身影。“东船西舫悄无言”的感伤琵琶、“朝中无宰相，湖上有平章”的骄奢淫逸……各种家国悲欢以及悲欢离合，都在小小的船儿里上演。

大家熟知的杜甫《绝句》：“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。窗含西岭千秋雪，门泊东吴万里船”，其中就说到了“船”。东吴就是三国时期的吴国，“吴以水师立国，有船五千余艘”（范文澜《中国通史》）。当时吴国造船水平世界领先，已经能用横梁和隔舱板形

成分隔舱，保证船体受损时只有个别舱进水。杜甫用“东吴船”指代建造技术高超的优良船只。

船的历史远不止于此。早在《易·系辞》中就记载了这样的话语，“舟楫之利，以济不通，致远以利天下”。对于古代普通百姓而言，日常乘船休闲有着别样的趣味。《诗经·柏舟》的主人公为忧愁所扰，夜不成寐，于是“泛彼柏舟……以敖（遨）以游”。诗中对柏船没有任何描绘，可能是一只很朴素的独木舟。

在船的演变历史中，很早就出现了一种非常特殊的船：游船。周穆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“旅行家”，据《穆天子传》记载，他乘坐游玩的船相当漂亮，“天子乘鸟舟、龙舟浮于大沼”，其船是龙凤的形状，也可能是船身彩绘着神龙凤鸟。

后世不乏乘船游幸各地的帝王，有的受到百姓欢迎，有的搅得民怨沸腾，比如隋炀帝、乾隆皇帝。早在西汉时代，淮南王刘安就在《淮南子》一书里历数帝王五种放荡淫逸的表现，其中之一就是“龙舟鸱首，浮吹以娱”，大意是说，天子的龙舟装饰着鸱鸟图案，浮行于水面，鼓乐齐鸣，劳民伤财，是败亡之兆。不过，船身龙形或龙绘最初并不是帝王专用，而是中华各民族共同的图腾，上古时期，百越人甚至“剪发文身，烂然成章以像龙子”（《说苑·奉使》），每年在天地纯阳之气极盛的端午这天，进行盛大的龙舟竞渡。后来因屈原自沉汨罗江，传说当地百姓划着龙舟竞相寻其遗体，“龙舟竞渡”又被赋予了纪念这位大诗人的含义。

老百姓也有漂亮的游船，而且是我国独有的，那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画舫。东晋顾恺之《洛神赋图》里出现的画舫，应该是现存最早的画舫图案。画舫自出现后，就受到人们的追捧，在不断的发展中，画舫也出现了多种形态。南宋时期，马和之的传世名画《柳溪春舫图》里的舫就是一艘单只船，水波盈盈，杨柳依

依，峭壁一面，舫一只，舟子在船尾，高士独坐船舱，画风清淡飘逸。

济南大明湖、南京秦淮河、扬州瘦西湖和杭州西湖以画舫闻名。西湖舟游始于唐代白居易，但那时未成风尚，南宋时进入鼎盛期。宋高宗赵构五十多岁就禅位给了孝宗，为了表示“圣孝”，淳熙六年（1179年）三月，孝宗带着皇后、皇太子恭请太上皇及太后游湖，还发生了一件颇有传奇色彩的故事。当时追随圣驾的有数百艘船只，有的表演杂耍，有的做买卖，有一个名叫宋五嫂的老妇人就在湖上卖鱼羹。太上皇命人召唤做买卖的船只，宋五嫂有幸得到说话的机会，她这样回复太上皇：“东京人氏，随驾到此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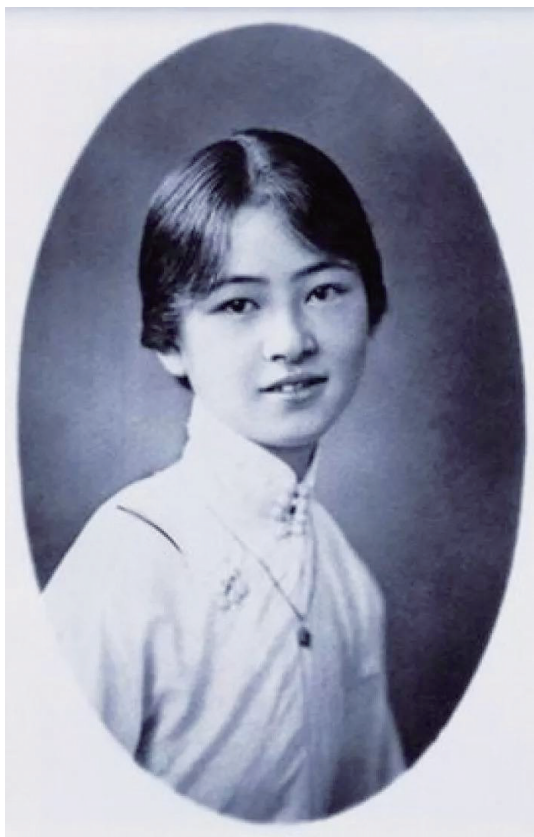
这一句话包含了太多往事。1127年，金兵攻破东京，俘虏了徽宗、钦宗二帝和后妃、皇子、宗室等3000多人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“靖康之难”。当时宋徽宗第九子，也就是后来的太上皇赵构出外招兵，免于此难，最后在杭州落脚，建立了南宋。或许是这句话勾起了赵构诸多回忆，于是宋五嫂被特召上龙船赐座。赵构念其年老，赏赐了金银绢等。得到太上皇御赏，宋五嫂的鱼羹名声大噪。元人张雨还在《西湖竹枝词》里感叹：“光尧内禅罢言兵，几番御舟湖上行。东家邻舍宋大嫂，就船犹得进鱼羹。”有趣的是，宋嫂鱼羹（也叫西湖鱼羹）演变成杭州的一道名菜，从南宋一直流传至今。

清代李斗《扬州画舫录·舫扁录》记载了扬州画舫的起源：当时，人们把不能承重的运盐船“牵入内河，架以枋楣椽柱”，供人乘坐游玩，成为游船。每只船还有名字，有的名字颇有趣，比如“红桥烂”，因为那只船有灶，可以煮肉，开船时下锅，到了红桥这个地方，肉就煮熟了，遂得名。还有船名为“一脚散”，因为船板极薄，被人们笑话一脚可以踹散。

□ 据《北京晚报》

林徽因为何改名？

林徽因原名林徽音，这是很多人知道的。她的名字是其祖父林孝询所取，源自诗经：“思齐大任，文王之母，思媚周姜，京室之妇。大姒嗣徽音，则百斯男。”但她为何改名，因何人改名？一些记述中却语焉不详。想来，是因为对使其改名的人情况不甚熟悉有关。



陈宇先生的《解读林徽因》一文，略微涉及此问题。作者言及自己采访林徽因堂弟林宣时：“林宣先生介绍，林徽因改名字还是他当的‘参谋’。林徽因原名林徽音。后来发现还有个男作家叫林徽音，她对其人作品很不以为然。但两个人名字形音都易混淆，遂起改名之意。征询林宣意见，他讲到有个朋友的女儿叫‘筠因’。不料林徽因一听竟拍案叫好，说自己那个‘音’字也太俗了，从此写文章就改徽音为徽因。并说：‘我不怕人家把我的作品误作是他的，只怕将来把他的作品错当成我的！’”

此文介绍了林徽因改名的相关情况，但对那个使得林徽因一定要改名的“男作家”介绍甚少。“林徽音”究竟何人，其作品为何让林徽因“很不以为然”？基本没有涉及。笔者翻读了一册收集多人回忆的《窗子内外忆林徽因》及一册《林徽因诗文集》，除个别文章指出其原名“林徽音”外，也几乎未记她的改名问题。

记得老作家施蛰存先生的文章提及过这位“男作家”林徽音。可翻读了几本所存散文集，没有寻到。近日获得一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《沙上的足迹》（书趣文丛第一辑），从中读到了这篇介绍这位“男作家”情况的《林徽音其人》。

据施蛰存记述，在1928年时，他的朋友戴望舒和杜衡，在杭州葛岭顶上，见到一个青年在焚烧一堆废纸。便心生好奇，前去搭话。该青年说自己是上海人，烧掉的是他的许多文稿，因为没有报纸和刊物愿意使用，退了回来，故此愤而烧之。

施蛰存在此还特别描述一句：“这个赤鼻子的青年，姓林，名徽音……说他的职位是银行小职员。”由此可见，林徽音应该是个文学青年，可所

写文章大多不达标，退稿甚多。

当时施蛰存与戴望舒正在上海办刊物，认识林徽音后，也给他发表了一些诗文（这些诗文或许是林徽音见到的作品）。有关林徽音的文字情况，施蛰存也有介绍，说是因为他们办的水沫书店要出版翻译作品，林徽音曾自告奋勇参与，他们便请他翻译一本“普特娄的《虚无乡消息》”。结果稿子发排时，由施蛰存校对，“才发现误译甚多”，甚至“中文也不好”。因此，施蛰存用了个较有意思的句子“以后就不敢请教了”。介绍到这里，“男作家”林徽音的文字水准，便可以看得清楚了。林徽因有才情，文笔佳，不愿大众把此人的作品与自己混同，倒也说得过去。

施蛰存还简单介绍了这位林徽音后来的情况。说淞沪抗战以后，林徽音“举止逐渐变得怪气”：夏天穿一身黑纺绸短衫，走在马路上，有时左胸袋里露出一角“白手帕”，有时纽扣洞里插一朵白兰花，像穿西装一样。这就很怪异了。再往后，此人吸上了鸦片。多次向施蛰存借钱，“急着要进‘燕子窠’”。1949年后，林徽音曾找过施蛰存，希望施蛰存为他介绍英语教师工作，又要求为他介绍翻译工作，大约因为了解其根底，施蛰存称：“我都无法帮助他……再后来，听说他被羁押在第一看守所……这以后，我就不知他的下落了。”

由施蛰存对林徽音情况介绍可知，这个林徽因口中的“男作家”，文学禀赋十分有限，外文与中文水准也不高，林徽因当然怕被大众混淆，索性连形音相近的名字也改了。通过施蛰存的这一番介绍，我们对林徽因改名的理由，也就可以充分理解了。

□ 据《北京晚报》